

一 “少昊之墟”与商奄故地

广袤美丽的山东大地，素有“齐鲁之邦”或“齐鲁”之称；至今，山东省仍简称为“鲁”。这些称谓，便渊源于两周时代建立在今山东大地上的两个封国，即齐与本书所叙述的鲁。

西周初年，周王室封鲁于“少昊之墟”，即今曲阜。最初，鲁国的疆域仅限于以曲阜为中心的约方圆百里的范围之内。后经历代开拓，至春秋时期，其疆域已蔚然可观，就其最大时而言，大致东近大海，南到今江苏北部，西至今河南以东，北至泰山之下。

鲁国地处鲁西平原与鲁中南山地地区，地理环境非常优越，是一个适于人类生存的好地方。早在鲁国建立以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并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

（一）发达的原始文化

据考古发现，约在距今 40 至 50 万年前，曲阜东边的沂蒙山区便有猿人生活，其时间约与北京猿人相当，被称为沂源人。在新泰、沂水、沂源、日照等地还发现了“沂源人”之后的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多居住在山洞中，过着群居的生活，使用木制工具和简单的打制石器，以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为生。在沂源发现的一处距今约 2—3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中，有大量灰烬、烧土、烧骨堆积，证明当时的人已知道用火，已告别茹毛饮血而进入熟食阶段。

在曲阜东边的沂沭河流域和西边的汶上，还发现有由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细石器文化遗址。

约距今 7000 年前，曲阜一带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处于北辛文化时期。1978 和 1979 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鲁南滕州官桥镇北辛村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器物。陶器有鼎、釜、钵、盆、碗、盘、壶、网坠、纺轮等；石器有铲、刀、镰、磨盘、磨棒、斧、箭镞等；骨器有骨针、骨梭、鹿角矛等。从出土的器物来看，这时生产力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有了手制的各类陶器，还能够用铲、

镰、磨盘、磨棒从事原始农业和粮食加工，以及使用弓箭、角矛、鱼网等武器和工具进行渔猎，并且能够使用纺轮、骨梭、骨针从事简单的纺织和缝纫。此外还发现了房屋遗址，说明当时人们已建造房屋，开始了定居生活。这时的社会形态，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北辛文化从距今约 7300 年到距今约 6300 年，经历了约一千年的发展过程。在曲阜、兖州、泰安、滕州等地，都曾发现北辛文化的遗存。

约公元前 4300 年至公元前 2400 年间，曲阜一带处于大汶口文化时期。从现有的材料看，曲阜一带很可能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在这一带就有十几处，如曲阜市的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安丘景芝镇、泰安大汶口、诸城呈子等，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尚未发掘的则更多，已探明的，曲阜有东魏庄、大果庄、西白村、小雪等处；兖州有苏家户、李家堂等处；邹县有曾家沟、鳧山顶等处。大汶口文化墓葬所反映的情况表明，其早期属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中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已形成，晚期已达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阶段。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物是“粟”。生产工具有磨制精美的穿孔石斧、穿孔铲以及大型的石锛，锋利的鹿角锄，骨、角、牙、蚌质的镰刀。渔猎虽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位置，但

家畜饲养业已相当发达，主要品种是猪和狗，还有可能有牛和羊。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陶器早期均手制，中、晚期产生轮制技术。后期的薄胎黑陶高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白陶的出现更可以表明制陶业的进步。骨雕工艺也相当发达，是我国新石器文化中少有的。出土有大量钻孔、雕花骨珠，剔地透雕或镶嵌绿松石的骨筒、象牙筒则最具有代表性，玲珑精致的 17 齿象牙梳和众多的雕花骨匕也独具特色。由出土陶器底部所留的布痕来看，纺织业也十分进步，经纬密度已与现在鲁西南的“鲁锦”相当。

据考古资料，大汶口文化居民有头部人工变形和拔牙的风俗，在很小的时候便使用某种工具使头部枕骨变形，使脑后部呈扁平状；约到十四五岁时，又要拔除门牙两边的两颗侧门齿，以表示其成年，到达了婚配年龄。此外，还有一种虽然不普及但也常见的习俗，即口中常常含有石珠或陶珠的习惯，致使其齿弓因磨蚀而严重变形。另外，他们似乎特别注重装饰，男女头上均带一种由成对猪牙制成被称为束发器或牙发约的发饰，脖子上有成串的珠状或管状项饰，双臂戴有成对的陶镯，手指上又有各种各样的指环，腰间挂着一种奇怪的佩带物——龟甲，死后手中还要拿上一件骨柄上嵌獠牙被称为獠牙钩形器的物件。这一切都表明以大汶口文化居民为代表的“夷人”有其独特

的宗教和习俗。

约公元前 24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间，曲阜一带进入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这个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较之大汶口文化有很大提高。工具虽仍以石器为主，但加工精美，已普遍使用磨制技术。制骨、制玉生产已专业化，出现有类云雷纹、饕餮纹的纹样。陶器则已普遍使用快轮制作，尤其是乌黑发亮、薄如蛋壳、造型美观的蛋壳黑陶，更充分反映了制陶技术的进步。龙山文化的房屋建筑已普遍采用挖槽筑墙技术，在我国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龙山文化遗址在曲阜及其周围地区分布更为密集，在曲阜的八里庙、梁公林，泗水的尹家城，兖州的立庙、西吴寺，邹城的七女城以及费县、临沂、滕州等地都有发现。在泗水尹家城发掘的 65 座龙山文化墓葬中，接近半数墓葬都是一棺，而少数大型墓还在棺外增加一重或两重椁。大型墓的墓室面积有的达 25.3 平方米，而最小的墓室只有 0.54 平方米，仅能勉强容身，有的甚至还没有墓圪，有的则弃尸于灰坑之中。大型墓葬的随葬品多而精美，而一般墓葬只有两三件，相当数量的墓葬中甚至一无所有。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已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

（二）悠久的古史传说

与曲阜一带发达的原始文化相伴随的，是悠久的古史传说。许多著名的史前人物，都与这一带有关。虽然这些传说不等于历史，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历史。

在遥远的古史传说时代，山东是东夷族的聚居之地，曲阜及其周围一带就是东夷人的活动中心之一。有关东夷人的最古传说，便是太昊的事迹。太昊，又作太皞或太皓，风姓，也有人认为他就是始创八卦、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的伏羲氏。《左传》中记载“陈，太皞之虚也”。即说位于今河南淮阳县境内的陈地是太昊故地。但又记载春秋时期的任（今山东济宁市市中区）宿（今山东东平境内）须句（今山东东平境内）、颛臾（今山东平邑境内）等几个风姓小国，都是太昊的后裔，掌管对太昊和济水的祭祀。这些小国都在曲阜周围。由此来看，太昊氏集团曾经活动于这一地区。

被奉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炎帝和黄帝，也与曲阜一带有着关系。炎帝族为姜姓，黄帝族为姬姓，原居住今陕西境内，后来先后逐渐向东迁徙。炎帝又号神农氏，传说他“初都陈，又徙鲁”，即把都城由陈迁至曲阜。因此在历史上也把曲阜称为“古炎帝之

墟”。在有关黄帝的传说中，则有“黄帝生于寿丘”，“黄帝自穷桑即位，后徙曲阜”等说。寿丘即在曲阜城东，穷桑一说在曲阜之北，或说就是曲阜。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法考证这些传说的具体史实，但他确实透露出炎、黄二族曾先后入主这一地区的消息。

在有关曲阜一带的东夷人的传说中，既多而又具体的，是关于少昊的传说。据说少昊名挚，又号金天氏，他“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因而曲阜一带有“少昊之墟”之称。春秋时期的郟国（今山东郟城附近），是少昊氏的后裔。《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载了其君郟子到鲁国朝见时，追述其先祖少昊“以鸟名官”的事迹：说是少昊初立之时，适有凤鸟来临，所以就以鸟开始记事，设置各部门的官长都用鸟来命名：凤鸟氏，掌管历法；玄鸟时，掌管春分、秋分；伯赵氏，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时，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祝鸠氏，就是司徒；鵙鸠氏，就是司马；鸛鸠氏，就是司空；爽鸠氏，就是司寇；鹁鸠氏，就是司事。此外，还有“五雉”，是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九扈”，是管理农业的官。现代学者多据此认为，少昊集团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凤鸟是部落的总图腾，鸟、鸠、雉、扈是各个胞族的图腾，五鸟、五鸠、五雉、九扈共二十四鸟则是各个氏族的图腾。少昊氏所设官职中，有各种专门掌管节气、农业、手工业的官职，也反映出当时农

业及手工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

东夷族的另一位传说人物蚩尤似乎也曾住迹于曲阜一带。蚩尤是东夷集团九黎族的首领，原居于少昊西边。《国语·楚语下》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逸周书·尝麦篇》又载：“蚩尤宇于少昊”即居住于少昊之地。当是蚩尤部落乘少昊部落衰落之际，东进而入主这一地区。据传说，蚩尤兄弟共 81 人，皆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勇猛善战，曾先后与炎帝和黄帝部落进行了两场大战。先是蚩尤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大败炎帝，炎帝向黄帝求援，黄帝于是出兵与蚩尤展开大战，终于将蚩尤擒获，斩杀于“中冀”。这些传说反映了蚩尤部落势力由曲阜一带向河北发展时，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炎、黄部落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矛盾，从而导致了两场大战。

据《逸周书·尝麦篇》记载。黄帝在擒杀蚩尤后，“乃命少昊濇即少昊摯为司马鸟师”。大概在蚩尤之后，少昊部落又重新控制了曲阜一带，并已成为以黄帝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一员。

在少昊之后，与曲阜一带有关的传说人物还有颛顼。《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可见他也在曲阜一带活动过。据说颛顼的后裔祝融之后分为八姓，商周时位于曲阜之南的邾国，即祝融八姓之一的曹姓国。颛顼是黄帝部落联盟中黄帝之后的又一盟主，他当是被推举为首

领后迁往商丘的。

舜是活动于曲阜一带的另一位东夷人首领。《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的记载。雷泽在今兖州，寿丘则在今曲阜。

尧、舜时期曲阜一带东夷人首领还有皋陶（又作咎繇）。传说皋陶生于曲阜，是少昊之后，曾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士”或“大理”，深得舜的信任。后来，舜将他选为继承人，因早死而没能即位。春秋时期，鲁城中有一座建于大庭氏之墟上的仓库称“大庭氏之库”，有学者认为大庭氏可能就是皋陶，他的字叫庭坚，故称大庭氏。其后人由曲阜一带南迁，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江淮流域的英、六等国就是皋陶庭坚的后裔。

夏王朝建立之前，曲阜一带的东夷人首领是伯益（又作化益、伯翳），嬴姓，其后运奄氏所建的奄国，即在今曲阜。相传伯益善于畜牧和狩猎，能晓鸟兽之语，在舜时被任命为掌管山林的虞官，还发明了凿井术和占岁之法。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得到禹的重用，并被选定为禹的继承人。在禹去世后，伯益因辅佐禹时间短，不能得到诸侯的拥护，就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而避居于箕山之阳。但《竹书纪年》中又有“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载，则是启以武力夺取了伯益之位。应当说这一记载更合乎事实，它反映

了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制已被阶级社会的王位世袭制所取代，历史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夏朝初年的东夷人首领后羿大概也与曲阜一带有关。据说夏启的儿子太康即位后，喜欢游猎，不理民事，引起黎民怨恨，诸侯离心。后羿乘机“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推翻夏朝，夺了太康的王位。故后羿又号“有穷氏”。曲阜古有“穷桑”之称，“有穷”或由此得名。

（三）商奄故地

在商代，曲阜一带不仅是东夷人的活动中心之一，还曾是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传说商的始祖契，是其母简狄吞吃玄鸟（燕子）卵所生，显然商人出自以鸟为图腾的东夷人。少昊氏以鸟名官，其中“五鸟”中有玄鸟氏，商人很可能就是从那个氏族发展起来的。早在商朝建立之前，商人就曾活动于曲阜周围。始祖契曾居于蕃，即在今山东滕州。到三代始祖相土时，又在泰山脚下设立东都。商朝建立后，又有多位国君立都于曲阜及其周围。在第 20 位商王盘庚之前，王都屡次迁徙。第 13 商王河甲奭曾把王都由囂迁到相，有学者认为，相即在今洙泗流域。第 16 位商王沃甲又由耿迁都到底，也有学者认为底即春秋时期鲁国的“费邑（今山东鱼台境内）”，或认为在泗水东。

到第 18 位商王南庚时，则把王都由庇迁至于奄，即今曲阜。南庚之后的商王阳甲、盘庚都即位于奄。盘庚即位后，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和维护其统治，又把国都从这里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传世的《尚书》中有《盘庚》三篇，记载了有关史实，说是在盘庚迁殷之时，许多臣民不欲去；迁至殷后，又有人不愿居于新都。盘庚经过对他们说服、训诫乃至以刑法恐吓，才得以定都于殷。在盘庚迁殷后，奄仍不失为商的东方重镇，商王也常常来往于奄和商之间。甲骨文中就有不少“王入于奄”，“贞，今如奄”之类的记载。

到了商朝末年，奄已成为东方的一大方国，其统治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汶泗流域，统治者便是前边提到的伯益的后裔运奄氏。奄，又作郟，因商朝曾立都于此，又被称为“商奄”。在周朝灭商后，奄国曾纠集东方部族响应商纣之子武庚起兵叛乱，经过周公三年征伐，奄才被打败，其君被迁往薄姑，鲁公伯禽才得以“因商奄之民”而被封在曲阜。

二 鲁国的建立

（一）鲁国的族源

鲁国是姬姓封国，出自周族。

周族相传是黄帝的后裔，最初居住于邠（今陕西武功），始祖名弃。传说弃的母亲姜嫄是有邠氏的女儿，帝誉的元妃，她在出游郊野时，因践踏巨人的脚印而有孕生了弃。姜嫄以为不祥，便把弃扔在陋巷，但经过的牛马皆避而不踩；又准备扔到山林，结果遇上伐木的人；再把他扔在河冰之上，又有鸟用羽翼保护它。姜嫄以为有神灵保护他，于是将弃抱回抚育。因曾三次将他抛弃，所以起名叫弃。弃在儿时，就喜好种植麻、豆。成人之后，更致力于农耕，因地制宜，种植五谷。后被尧任命为农官，教民耕种，号曰后稷。这些传说，反映了周人在后稷时代已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并说明周族在很早以前就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

大约在夏朝末期，后稷数代之后的公刘又率周人

迁徙到豳（今陕西旬邑）。这里的水源丰富，土地肥美，周人在这里开垦荒地，从事农耕，逐渐兴盛起来。

公刘传九代至古公亶父。因遭到戎狄族的侵逼，古公亶父又率领周人离开豳地，越过漆、沮和梁山，迁到岐山之阳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在这里，古公亶父率领族人开辟土地，营建城邑，设置官吏。这时的周族已经踏上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古公亶父也因其功业，后来被周人追尊为“太王”。

古公亶父传位于幼子季历。早在古公亶父以前，周人与商朝已有联系。季历时，周族仍臣服于商。在商王武乙、文丁时期，季历在商朝的支持下，对邻近的戎狄部落展开了一系列的征伐，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周人的势力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季历也被文丁封为“牧师”，即诸侯之长。此时周已成为商朝西方的强大方国了。

周族势力的发展，引起了它与商朝的矛盾。为了遏制周族的发展，商王文丁杀了季历。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即后来有名的周文王。文王表面上仍臣服于商，暗中却招揽贤才，争取与国，积极发展力量，作着灭商的准备。后来，文王因受到商纣王的怀疑而被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周人向纣王献上美女、宝马等珍奇之物，博得了纣王的欢心，结果不仅释放了文王，还命文王为“西伯”（西方诸侯之

长)并赐予“弓矢斧钺”，表示授予文王征伐诸侯之权。此即所谓的“文王受命”。

文王受命后，乘商纣陷于与东夷族的战争，无暇西顾之机，凭借手中的征伐之权，对商朝西部的方国部落进行了一系列的征伐，先后打败犬戎、密须、耆、邢、崇等国，基本清除了商朝的西部屏障。为了便于继续向东发展，文王在沔水西岸修建起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并把都城迁到这里。在迁都的第二年，文王就去世了。文王在位共 50 年，据说在他去世时已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灭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任命姜尚为师，周公姬旦为辅，在他们的辅佐下，武王加紧了伐商的准备。周公姬旦为文王之子，武王的同母弟弟，因他的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便是他的长子。

（二）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

在周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商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却不断激化，到最后一代国王商纣之时，这些矛盾已发展到顶点。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他的残暴统治之下，平民奴隶，不断反抗；方国诸侯，纷纷叛离；统治阶级内部，离心离德。尽管商纣

采用极其残酷的刑罚对内外的不满和反抗进行镇压，但整个社会更加“如蝮如螭，如沸如羹”，动荡不安。面对正虎视眈眈的周人，商朝的灭亡已势不可免了。

周武王即位后，将国都迁到泃水东岸的镐（今陕西西安西北），第二年便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诸侯，检阅军队，进行了一次伐商的演习。据说这次演习有八百诸侯不期而至，皆说“纣可伐矣”。但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班师而归。此后二年，武王见商朝统治集团的矛盾更为严重，商纣已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伐商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便亲自率领戎车 300 乘，虎贲（勇士）3000 人，甲士 45000 人，及友好邦国和庸、蜀、羌、鬻、微、卢、彭、濮等部族的军队，从盟津渡过黄河，正式讨伐商纣。

次年正月甲子日清晨，武王率军抵达距纣都朝歌 70 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举行战前誓师。而此时商纣王才得知消息，只好把大批奴隶和战俘也武装起来，拼凑成一支 17 万人的军队仓促应战。但在牧野之战中，商军皆不愿为纣王卖命，纷纷阵前倒戈。商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城内，自焚而死。牧野之战后，武王在朝歌举行了接受“天命”的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这一年是公元前 1046 年。

牧野一战，周虽然灭掉商朝，但殷商的势力还远未被彻底消灭，对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如何控制，成

为周朝统治者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太师姜尚主张将殷民全部杀掉，召公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周公则提出了既要以武力监视，又要加以笼络的办法。应当说周公的主张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殷商遗民的反抗情绪的作用，更有利于周朝的统治。武王采用了周公的建议，把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商都，使其奉守商祀，统率殷民。同时又把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封在武庚周围，以防其反侧，号称“三监”。

周武王在灭商后两年就去世了，因其子成王年幼，由其弟周公旦摄政，辅佐成王。但管叔、蔡叔等人不服，散布流言，称周公欲加害成王，篡夺王位。武庚见周王室内部发生矛盾，便乘机联合“三监”起兵反叛，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十几个方国部族也纷纷响应。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周公表现出卓越政治家的才能。他首先安定了内部，然后亲率大军，举行东征。在平定武庚与“三监”之后，周公继续挥兵东进。在参与叛乱的东方诸国中，薄姑和奄势力最强。据说，周公采纳了辛公甲“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小以劫大”的建议，先征服了许多东夷小国和部族，使奄、薄姑陷于孤立，才将其灭掉。薄姑之君与民人被迁往他地，奄国之君则被迁到薄姑。历经三年苦战，周公终于平定了叛乱。

(三) 伯禽封鲁

周朝建立以后，从武王到成王，进行过多次分封。武王分封的对象，一是神农、黄帝、尧、舜、禹等所谓的“先圣王”后裔，其实只是对这些已经服从周朝的国家表示承认而已。二是开国的功臣谋士，对他们的分封，除了是一种对功劳的奖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起到控制当地，以“藩屏王室”的作用。

作为在灭商中有巨大功勋的周公自然在首封之列，在灭商的第二年被封在鲁。不过这时的鲁不是在今曲阜一带，而是在今河南鲁山一带。由于当时天下初定，周公需留在王室辅佐武王，不能亲自就封，便有其长子伯禽代为就封，成为实际上的第一位鲁国国君。

武王时期的分封，主要在原商朝的统治中心周围和以西地区，统治力量并没有达到原商朝以东的所谓“大东”地区。周公东征胜利后，怎样建立起对东方的有效统治又成为新的重要问题。周公在这一问题上再施展其政治才能，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在地处中原的洛水之滨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又称成周），驻军把守，以便于控制东方。二是对原武庚统率下的殷民分而制之，一部分被迁到成周，其余被分赐给商纣的哥哥微子启或其他姬姓诸